

容闳的西学与洋务

(一) 导 言

容闳的一生(1828~1912年)正是处于中国的大变局,一方面传统的儒家学说由于西学的冲击而开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另一方面,由于环境的需要,中国却又不得不从西方世界吸取新的知识及技术,以图奋发自强。

容闳由于自幼即受教育于教会学校,亦曾经在美国耶鲁大学攻读,成为中国第一个在美国的大学毕业生,而毕业后即回中国参与洋务运动,故其事功向为史家所乐道,容闳亦一向被誉为“中国现代化的开路先锋”,启发“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然而,容闳的西学思想及办理洋务的态度,却鲜为人知,即便有论著述及,亦是语焉不详,缺乏深入的研究。

本文试图从容闳受学经过、西学对他思想的冲击以及他发表过的言论和著述来分析他的西学思想,从而评论他的“全盘西化论”及彻底否定传统中国文化的思想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影响。

本文亦试图从容氏西学思想的角度来衡量及评价他办理洋务的态度和方法,特别是他在任内督促“留美幼童”肄业的表现。本文利用一些在美国发现的有关“留美幼童”的原始资料,重新对容氏办理洋务的态度及方法作全面的评价。

中国在现代化的起步时,容闳所提出的“西方模式”,虽然富于革命性,并在当时起了一些积极的作用,但它的价值取向及所朝向的

道路却大有商榷的余地。容闳要以“西学”作为中国发展的目标，但对大部分知识分子及当政者来说，“西学”只能作为一种自强的手段，而不是目标，因此容闳的不为重用，实植根于他的“西学”思想。

（二）容闳求学经过及西学思想的形成

容闳求学的经过，在他于1909年出版的英文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一生》（中译本改名为《西学东渐记》）^①中有很生动的、详细的描述。而美国的两位学者汤玛士·勒法格（Thomas La Fargue）^②、爱曼德·威菲（Edmund Worthy, Jr.）^③亦有叙及。

各种资料显示，容闳接受传统中国教育的机会非常少，这很可能是影响他毫无选择性地接受“西学”的原因之一（他的中文程度十分低），另一原因则可能是由于他的家庭背景及他在少年时代所看到的中国落后的一面，从而被西方的“优越文化”深深吸引，因而导致排斥中国传统文化。

容闳生于贫农之家^④，没有机会接受传统儒家教育。然而，由于他们的家位于离葡属澳门只有四里的南屏乡（广东香山县），受对外贸易及西方思想的影响，村民对“西方老番”的猜忌，却大

①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New York, 1909.), 中译本名为《西学东渐记》，由徐凤石、恽铁樵合译，1981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校订重印。日文版则由百濑弘翻译，坂野正高解说，1969年在东京出版。

② *China's First Hundred* (Pullman, WA: Washington State College Press 1942), 此书有中文译本，由高岩翻译，书名为《中国幼童留美史》，于1980年由香港文艺书屋出版。

③ *Yung Wing in America*,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XXX IV. 3 (1965), pp. 265 ~ 288.

④ 有关容闳的生卒年月日问题，可参考高宗鲁《有关容闳的史料问题》，载《传记文学》第36卷第3期（1980年3月），第111~116页。

为减弱。^① 在这种环境之下，容闳的父母便希望儿子能学习洋文，以便能在外国人的商行谋一差事，所以在他7岁的时候，便送他到澳门郭士立牧师（Rev. Charles Gutzlaff）夫人在家中所办的学校就读。^② 由于容闳在班中年纪最幼，深得郭夫人的喜爱，而容闳对她亦敬慕不已。在郭夫人谆谆善导之下，容闳开始了学习西方知识的第一课。

但影响容闳一生最深的一个外国人却是从美国来华的牧师森美·勃朗（Rev. Samuel R. Brown）。勃朗牧师曾在耶鲁大学受教育，于1839年出任刚在澳门成立的玛礼逊学校校长。玛礼逊学校是当时的广州外侨社团为纪念第一位到中国布道的基督教牧师玛礼逊（Robert Morrison）而成立的“玛礼逊教育会”（The Morrison Educational Society）所办的学校，“使本地（指中国）学童，在他们自己的学校中，学习英文，通过这进而得以探求西方的各种知识”^③。

容闳于1841年进入玛礼逊学校就读，班中同学，尚有黄胜、黄宽、唐景星等人。翌年，中国于鸦片战争中战败，香港割让给英国，玛礼逊学校亦迁至香港，容闳也随之而到了香港，继续学业。

勃朗牧师是一个有经验的教育家，其教学方法，据容闳自传中所述，实与中国传统的教学方法迥异：“勃先生一望而知为自立之人，性情态度沉静自若，遇事调处秩序井然。其为人和霭可亲，温然有礼；且常操乐观主义，不厌不倦，故与学生的感情甚佳。其讲授教课，殆别具天才，不须远证，而自能使学生明白了解。此虽由于赋性聪敏，要亦阅历所致。盖当其未来中国、未入耶鲁大学之前，固已具有教育上的经验矣。故对于各种学生，无论其为华人、为日人、或为美人，均能审其心理而管束之。知师莫若弟，以才具

①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下作《自传》）第1章：“幼稚时代”。

②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下作《自传》）第1章：“幼稚时代”。

③ La Fargue 前揭书，第18页。

论，实为一良好校长。”^①

但容闳接受勃朗的教育，时间并不是很长，因勃朗的健康情况欠佳，于1846年便决定回美。临行前，征求愿赴美继续学业的学生同往。时容父已逝世，容母初不允容闳赴美，后因勃朗利用教会的关系及捐款，允负责容闳一切留美费用，同时给予容母至少两年的生活费，所以容闳终于有机会赴美留学，同行学生中除容闳外，尚有黄胜、黄宽兄弟。^②

1847年1月4日，勃朗一行由广州出发，乘船前往纽约，三名中国学生的旅费是由广州外国人士所共同捐助。

从1847年到1854年容闳留美受教育的这段时间，对他的思想及文化的选择有决定性的影响。可以想象得到一个年方十九的中国青年，离开积弱、贫困及受帝国主义欺凌的祖国，到美国继续学业，在彼邦所见所闻，心灵及思想上受到的冲击及震荡会是何等之大！从现存的珍贵资料显示，一向缺乏传统中国教育的年轻的容闳，在到美国以后的短短几年里，他对西方的文化取向，便由歌颂而到了认同，最后，更认为中国若要自强，必须放弃一切传统文化，以“西学”作为手段及目标，彻底地改变，全盘地西化，这样中国才有前途，才有希望。

容闳抵美后，便进入麻省的孟松中学（Monson Academy）继续学业，一直到1850年毕业进入耶鲁大学就读。时孟松中学的校长为曾在耶鲁大学受教育的海门牧师（Rev. Charles Hammond），对容闳特别照顾，因此容闳在孟松虽是短短的两三年，但已被西方教育深深吸引，而开始对中国传统有所揶揄。他在写给一位在香港时认识的朋友畏三卫（Samuel Wells Willams）的信中这样说：

当然你是会觉察到我不会离开我家人的感受，因我曾答应

① 《自传》第2章：“小学时代”。

② 《自传》第2章：“小学时代”。

他们我将会在两三年之内便回中国。但你很清楚中国人的偏见及对事的误解，由于心智尚未启蒙，他们不可能像你一样能看得出能接受教育的目标、好处及价值。无知与迷信已蒙蔽了他们的心灵，他们又怎可以看得出（接受西方教育的）价值？（1849年4月15日）^①

在同一封信中，容闳对畏三卫更进一步表示，由于他被美国式的自由教育所吸引，他差不多已决定要留在美国攻读大学。但攻读大学的学费和杂费还尚未有着落，所幸乔治亚州的萨伐那妇女会从勃朗牧师处得悉容闳的情况，答允资助。^② 容闳即赴康州的新港（New Haven），考取耶鲁大学的入学资格，所以从1850年开始，也就是他22岁的那一年，容闳便在耶鲁的校园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涯。

如果孟松中学给予了年轻的容闳在思想上那样大的冲击及对西方教育的认同，那么耶鲁大学给予容闳的思想上的启迪及影响，更是无法衡量了。他进入大学不久，便兴冲冲地在信中给畏三卫这样写道：

大学生活对我来说很新颖，虽然它严格的操守的滋味我在（孟松）中学时便已先尝。这里的一切事情在任何时间都很有规律及有责任性，这是训练一个经世致用的人的最好方法……古旧的耶鲁校园是被一股进取心的气氛所围绕……我从来没有接受过这么样的心灵冲击，我实在十分享受这样的影响。

① 此信现藏于耶鲁大学的史特令纪念图书馆（Sterling Memorial Library）（显微胶卷）。

② 《自传》第5章：“大学时代”。

(1850年12月25日)①

容闳在耶鲁大学学习的四年间，读书很是用功，而预想中的经济困难，也因他自身的苦干而渐改善。他像其他美国学生一样，在校中学舍担任干事，而得免费食宿，又负责采购等庶务，并在饭厅中工作。他在大学二年级时，两度获得英文首奖，因而在耶鲁重要文学社团——兄弟团结会（Brothers in Unity）担任副书记。②

容闳在耶鲁的学业表现并不很突出，但他得到同学的敬爱，也成为校中知名之士。他适应性很强，1854年，当他从耶鲁毕业时，他已完全“美国化”了。1852年，他已归化入美国籍，同时亦已信奉了耶稣教义，也把美国作为第二家乡了。③

从上述可见，到他大学毕业时，容闳在思想及心态上已完全认同了西方的价值及文化。他觉得中国人“无知”、“迷信”，及有“偏见”。他认为西方教育是最好的教育方法。概而言之，他觉得西方文化比中国文化优越。一如他在自传中所说，中国若要富强，中国人一定要接受“西学”的启蒙：

盖既受教育，则予心中之理想既高，而道德之范围亦广，遂觉此身负荷极重，若在毫无知识时代，转不之觉也……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予后来之事业，盖皆以此为标准，专心致志以为之。溯自1854年予毕业之时，以至1872年（中国有第一批留

① 此信现藏于耶鲁大学的史特令纪念图书馆（Sterling Memorial Library）（显微胶卷）。

② 《自传》第5章：“大学时代”。

③ Worthy 前揭文，第270～271页。

学生之派遣)，则此志愿之成熟时也。^①

由此可见，尽管容闳的文化取向是西方的模式，然而在耶鲁的日子里，他关心中国的前途，对中国的现代化欲尽一臂之力。他认为中国的惟一希望在放弃古老哲学文化，而尽快吸收西方科技文明。欲达到此一目的，中国政府当精选年轻子弟前往欧美留学。

很明显，容闳在美国接受的西方教育，一方面使他感到有“优越感”；而另一方面，也使他产生一种“时代使命感”。他说：

更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此痛苦与压制，在彼未受教育之人，亦转毫无感觉，初不知其为痛苦与压制也……既自命为已受教育之人，则当日夕图维，以冀生平所学，得以见诸实用。此种观念，予无时不耿耿于心。^②

容闳回中国后就促使清政府派遣学生赴欧美留学，实在也是受这种“时代使命感”的驱使。容闳的构想是派中国学生长住欧美，接受教育，并彻底吸取“西方观点”，再将这些“西方观点”及所学之长技带回中国，把中国重建在“西学”上。

(三) 西学的实践：容闳与洋务

容闳于185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后，于同年年底（11月13日）从纽约启程回国。其实当时容闳已取得美籍，可长期居留在美国，但他毅然回归贫困、积弱的祖国，可见他有积极改善祖国的决心。

容闳归国以后，即着手计划如何改造中国，而其计划之实现又以派遣留学生赴美为最重要。在实现这一计划的过程中困难重重，

① 《自传》第5章：“大学时代”。

② 《自传》第5章：“大学时代”。

主要的原因是当时中国的政治及文化环境是保守主义，加上中国传统上以文化优越自居，派遣学生赴欧美学习即等于是承认“蛮夷”文化的优越性，这种观念尚未为士大夫及政府所接受。此外，当时正值太平天国起义，清政府正疲于奔命镇压起义，无暇顾及容闳的建议。即到了太平天国起义平定及洋务运动的开展，“西学”亦只限于在中国国内吸收，请洋人来中国或翻译西书，而没有实行派遣中国学生赴外学习，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19世纪70年代才起了变化。

基于此，容闳初回中国，很难实现其抱负。加上他的中文程度已大大倒退，又只有外国学位，即使有一腔热血为中国现代化作出贡献，他也不为时人所接纳。一位当时人这样记录道：

在中国没有什么需要他（按：指容闳）去做的事。那里除了微贱的亲属外，他没有朋友，不会给他任何地位和照顾……他在本国人当中，不可能不受到歧视、猜疑和敌对。摆在他面前的是一派阴郁险恶的前景。^①

在这种情况下，容闳只能担任一些闲散的工作，例如在香港任美国领事的书记、在上海任海关翻译及任英商宝顺洋行（Dent and Company）书记等职。此外，亦曾替曾国藩去美国购买机器，但留学教育的建议，则苦无机会上陈。其实容闳亦曾谒见过太平天国的干王洪仁玕，可惜容的几项建议亦不为他所纳，容闳很是失望。^②

关于派遣学生赴欧美留学的想法，实非仅出自容闳。容闳在他的《自传》中及后来一些史家夸大了他在这一事情中扮演的角色。

① Joseph H. Twichell 牧师于1878年4月10日在耶鲁大学法学院之演讲，附录于《自传》中。

② 参见《自传》各章。

其实当时在野的如冯桂芬，当政的如恭亲王奕訢及李鸿章，^① 在洋务运动刚开展时便曾考虑到派遣留学生赴外的可能性，但由于当时守旧派反对势力大，加上洋务派对在国内兴办的“西学”教育及设施寄望又大，所以派遣学生赴外的想法便没有付诸实行，直到后来容闳的教育计划得以上达，而在国内举办的“西学”教育又不见有显著成效后，这个想法又再重新被讨论及考虑。

容闳教育计划的得以上达，是因为得到江苏巡抚丁日昌的支持，但过程还不是很顺利。在 1867 年当容闳于苏州谒见丁日昌时，容即劝其推行新教育计划。丁让容草拟条陈，由他请军机大臣文祥代奏。容闳即拟条陈四项，其中第二项即为其新教育计划：

中国宜选派颖秀青年，赴洋留学，以为国家储备人才。其方法可先定学额一百二十名试办，分四批按年递派，每年三十名，学龄以十二至十四岁为限，各生以留学十五年为限。派出时并须以汉文教习同往，因幼年学生在美，仍可兼习汉文。至于学生在外国膳宿入学等事，当另设留学生监督二人来管理。至于留学经费，可于上海关税项下提拨数成充之。^②

容闳所列条陈虽分四项，但《自传》中谓重点所在，则为此第二项之教育计划。但是当时文祥刚丁母忧，条陈遂不幸被搁置。

到了 1870 年，以天津教案发生，曾国藩与丁日昌奉命前往调停，容氏亦随丁北上任译员。在此情况下，容闳利用这机会促丁日昌向曾国藩会奏教育计划。也就是在这种机缘之下，容闳的建议终于上达清廷，并最终促成 1872 ~ 1875 年间清政府的遣派幼童赴美

① 《筹办夷务始末》卷 15，第 31 ~ 34 页；卷 25，第 9 ~ 10 页。又《海防档·机器局（1）》第 13 ~ 21 页。

② 《自传》第 16 章：“予之教育计划”。

留学。关于这方面的详细情形，笔者已另撰专文叙论，这里不再赘述。^①

值得在这里分析的是：清廷之所以接纳容闳的建议，决定派遣幼童赴美留学，其目的只是希望能加速及更有效地学习西技，希望这批学生学成回国后，对中国的自强运动有所贡献。自强运动就是一个所谓“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当时洋务派的精神及准则，因此派遣留学生赴美只是希望能更有效更快地学习西技以自强，是一种手段，而非欣赏西方文化、承认西方文化的优越性。因此，除西技外，清政府并不希望派去美国的120名官学生吸收其他的“蛮夷”文化及把它带回中国。

基于此故，幼童虽身在美国，学习西技，但仍得同时接受中国传统教育，因有若干名汉文教习随同幼童赴美，对幼童进行中文教育，希望幼童的语言、文化及意识形态不会因身在异域而有所改变。为此之故，清政府还不惜动用巨款（时约美金四万三千元）在美国设立校舍对幼童进行儒家教育。幼童还得学习儒家礼节及忠君思想，近人顾敦铎收集幼童在美时所做的中文课业，发现他们所接受的教学密集而又艰深，^②足证清政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目的。

然而对于容闳来说，一如前述，“西学”对中国的改良，不单是一种手段，而且也是目标。他要中国放弃旧传统，按照西方的模式来现代化，这就等于是以“西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精神来改造中国。他希望留美幼童在美期间尽量吸取西方的“优越”文化，待他日学成回国，将西方文化的种子散播在中国国土上，“以西方

① Edwin Pak-wah Leung, (梁伯华) *Education of the First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 Genny Lim (ed). *The Chinese American Experience* (San Francisco: 1984) pp. 203-210; Edwin Pak-wah Leung, *China's Quest from the West: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1872-1881*, *Asian Profile* 11.6 (December 1983) pp. 527-534.

② 顾敦铎：《百年的留美教育的回顾与前瞻》，载《教育与文化》第8卷第1期（1955年6月），第4～14页。

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①——这是容闳对留美幼童的期望。

事实上，从1872~1881年容闳任幼童出洋肄业局留美幼童副监督期间，由于他对美国的环境及教育制度熟悉，他对幼童着实有着无比的影响力。整体而言，他对幼童教育的方法，与他一贯的“西学”思想是一致的。幼童一到达美国，容闳便把他们分配到不同的美国家庭寄居，以便他们能学习及吸收西方的文化，这实在与清政府的原意相违。^②

幼童由于年纪小，又没有和其他中国幼童一起生活，而且一开始便进入美国学校受教，在这种环境之下，他们很快便适应了美国的生活。不单如此，在很短的时间内，幼童“美国化”的程度，使美国人也惊讶不已。在教室里，幼童们很快便熟悉了英语；在球场上，他们也敢脱下了丝质的官式长袍，向美国学生挑战。^③

起初，幼童规定必须穿长袍和结辫子，颇似女孩，美国同学均哄笑把他们叫作“中国女孩”！这种嘲笑，令不少幼童决定穿西装，这是容闳及“幼童出洋肄业局”正监督陈兰彬意见冲突之开始。容闳了解幼童之苦衷，始终表示同情，但陈兰彬认为脱下象征中国士大夫的长袍，令人匪夷所思。幼童也想剪去辫子，但清政府严令禁止，因为辫子是忠君爱国的象征，这事也造成正、副监督之

① 《自传》第5章：“大学时代”。

② 根据幼童之一的温秉忠回忆录：*Reminiscence of a Pioneer Student* 是于1923年12月23日于北京的海关学校演讲稿，副本现存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图书馆，该馆亦藏有不少研究容闳的资料。

③ Edwin Pak-wah Leung, (梁伯华) *Education of the First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 Genny Lim (ed). *The Chinese American Experience* (San Francisco, 1984) pp. 203-210; Edwin Pak-wah Leung, *China's Quest from the West: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1872-1881*, *Asian Profile* 11.6 (December 1983) pp. 527-534.

间更多的冲突。^①

最大的冲突，却是在于幼童的中文教育方面。由于幼童对美国一切的全面接受，使他们对中文课业的学习日益困难。容闳赞成完全与中国习俗隔断，幼童对中文课业的荒疏，他不以为然，未思纠正，而且还经常对幼童袒护^②。容闳这种态度，使“幼童出洋肄业局”遭受到局内委员及中国国内保守派最严厉的指责及攻讦，最后，该局于1881年被撤销，幼童们学业未完成而被召回国，此点实为重要原因之一，容闳本人应负大部分责任。

关于容闳对幼童的教学方法导致幼童的提早被召回，可从最后的一位监督吴嘉善对容氏的控诉看出：

任其放荡淫佚，并授学生以种种不应得之权利……专好学美国人为运动游戏之事，读书时少而游戏时多，或且效尤美人，入各种秘密社会，此种社会，有为宗教者，有为政治者，要皆有不正常之行为，坐是之故，学生绝无敬师之礼，对于新监督之训言，若东风之过耳，又因习耶教科学，或入星期学校，故学生已多半入耶稣教……若更令其久居美国，必致全失其爱国心，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③

① Edwin Pak-wah Leung, (梁伯华) *Education of the First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 Genny Lim (ed). *The Chinese American Experience* (San Francisco: 1984) pp. 203-210; Edwin Pak-wah Leung, *China's Quest from the West: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1872-1881*, *Asian Profile* 11.6 (December 1983) pp. 527-534.

② Edwin Pak-wah Leung, (梁伯华) *Education of the First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 Genny Lim (ed). *The Chinese American Experience* (San Francisco: 1984) pp. 203-210; Edwin Pak-wah Leung, *China's Quest from the West: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1872-1881*, *Asian Profile* 11.6 (December 1983) pp. 527-534, 又可参考 La Fargue 前揭书，第45~46页。

③ 《清季外交史料》卷15，第36页。

李鸿章在1880年5月10日给“幼童出洋肄业局”前任监督陈闳兰的信中，也提到容闳对幼童的中文教育不重视的这一件事：

容元甫（按：即中文教习容增祥）来谒，言学徒抛荒中学系属实情，由于莼甫（按：即容闳）意见偏执，不欲生徒多习中学，即夏令学馆放假后，正可温习，莼甫独不谓然。^①

留美幼童的提早被召回，固不单因幼童的过分“美国化”及荒废中文教育所致，^②但这无疑是主要的原因之一。“留美幼童”原来的计划是要幼童只学西技，而非其他的“蛮夷”文化；要熟读四书五经，学习内圣外王之道。然而由于容闳的鼓励，幼童们的“美国化”程度使清廷震惊，盖因原本的计划已破坏无遗，至此，幼童之遣回，已成必然之势。尽管容闳运动美国的政学界知名人士向清政府施压力，^③亦是无补于事，于1881年9月6日，“幼童出洋肄业局”终于被撤销及幼童不得不离美回国。这件事对容闳的理想及抱负实在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四) 结 语

容闳的“西学”思想与他的“洋务”事业，在晚清的政治环境中可以说是相辅相成，而同时亦互相排斥。

容闳由于接受的是彻头彻尾的西方教育，始终信服西方文化的优越性。他在得到教会人士协助的这个机缘，赴美国接受西方文化的洗

①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9，第20页。

② 当时美国有所谓“排华运动”，清政府抗议不得要领，亦有考虑以召回留美幼童作为一种抗议。

③ 包括美国前总统 Ulysses S. Grant、名作家 Mark Twain 及其他政学界知名人士，参见《自传》第19章：“留学事务所之终局”。

礼，目睹西方社会的自由、科学化及富强的现象，使他对西方文化可使中国振兴的想法深信不疑，而且躬身力行。

然而，容闳对西方文化却是毫无保留地、毫无选择地接受。他鄙夷中国文化，觉得它是使中国落后的原因。他认为中国若要强大起来，一定要放弃旧传统，一心一意地接受“西学”，以西方及“西学”作为现代化的模式。他本人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以及文化认同，都是不折不扣的西方模式。对于中国的现代化，他的主张可以说是“全盘西化论”，也就是说，他希望看到一个以“西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国。这在他那个时代的中国来说，就是对思想比较进步的洋务派而言，都是匪夷所思、不能接纳的。

清末洋务派开展的自强运动，实质上还是一个保守性、妥协性很强的运动。他们虽承认西方技艺的有效性，但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对优越性，却是毫不怀疑的。他们所要坚持的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西学”只不过是自强的手段，而不是目标，这与容闳的想法及信念是大相径庭的。

然而，对洋务派而言，由于容闳对“洋务”有切身的认识，所以他还是有被利用的价值。他被任命为“幼童出洋肄业局”副监督，就是因为他对美国的环境及西方的教育制度有深切的认识（相信当时中国没有另一个人比容闳更胜任该职），从这点来看，容闳的西学与洋务，是相辅相成的。

但是，相辅相成以后跟着来的，却是排斥的一面。容闳是要把西方文化全盘地搬到中国，而不单只是科技上的学习。他希望借着幼童在美国留学的机会，尽量学习西方的文化，而不重视他们的中文教育。容闳的意思是要幼童学成回国后，能作为一个文化传播的中介，把西方的文化移植到中国的国土上来。但他这个教育幼童的方法，却自然而然地招致儒学之士及最后包括洋务派的指责及攻讦，而导致留美幼童的撤回。“幼童出洋肄业”事件所引起的中、西学的冲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实在是近世中西文化论争的开始，比五四时代还早了半个世纪！

容闳由于西方教育及背景的影响使他尊西学而黜中学，对西方

作出文化上的认同，但他始终念念不忘自己的祖国。他虽入了美国籍（1852年），也娶了美国太太（1875年），而且把美国作为他的第二故乡，但他爱中国之情却是一贯的。故无论他的西学理论在中国是否可行及会否为人接纳，但容闳始终言行一致地为中国的现代化努力耕耘。他为了实现改良中国的计划而四处奔走，从谒太平天国的干王到为清廷效力，从维新运动到革命运动，^① 容闳都不断地在寻找机会来替自己的祖国服务。若论容闳为一机会主义者，倒不如更贴切地说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的爱国主义已超越一切政治集团或政权，相信在这方面不少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要以容闳为榜样！

^① 参考《自传》第22章：“戊戌政变”；又罗香林《香港与中西文化交流》一书中之第4章：“最早自香港留学美国之容闳及其所倡之洋务”；Key Ray Chong, *Americans and Chinese Reform and Revolution, 1898-1922*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4)；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藏有容闳与 Homer Lea 及 Charles Boothe 的通信。